

唇枪舌剑

九一八事变时期的中日外交

著

八事变时期的中日外交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抗日战争史丛书

列入国家八·五重点图书规划

荣获第二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抗日战争史丛书续编·外交系列

唇枪舌剑

——九一八事变时期的中日外交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抗日战争史丛书续编·外交系列

唇 枪 舌 剑

——九·一八事变时期的中日外交

俞 辛 焯 著

责任编辑：郑纳新

封面设计：林胜利 赵子宽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邮政编码：541001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36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漓江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375 插页：1 字数：335千字

1997年11月第1版

199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0001—2000册

ISBN 7-5633-2352-X/K·086

定价：(平) 15.00元

(精) 20.00元

《抗日战争史》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 王桧林

副主编 江 淳 侯样祥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则勤	门立军	王桧林	江 淳
刘建业	乔还田	李良志	杨圣清
武月星	林治波	侯样祥	郭德宏
解学诗			

《抗日战争史》丛书

总 序

杨得志

在本丛书编委会的同志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以及广大从事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抗日战争史》丛书陆续出版问世了。这是我国学术界、出版界为推动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实事求是地向广大读者展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之全貌,以实际史实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而做出的有益尝试,是很有意义的。对此,我作为一个亲身经历过抗日烽火的老战士表示衷心的祝贺。

翻开中国近现代史,一个最基本的历史事实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后的100多年的历史,既是一部中国人民的血泪史、屈辱史,也是一部中国人民的奋斗史、胜利史。在这1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民受尽侵略、凌辱、欺压,甚至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同样,正是在这受尽侵略、凌辱、欺压的100多年里,中国人民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反抗阶级压迫,曾进行了可歌可泣和波澜壮阔的斗争。但是,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之前的所有斗争,并没能使中国人民摆脱被侵略、被掠夺、被奴役、被压迫的悲惨地位,只有到了抗日民

族解放战争，中国人民反帝斗争才由失败转向胜利。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全国各族人民，包括各民主党派、各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海外华侨团结奋斗，经过长时间的艰苦卓绝、前赴后继的顽强斗争，中华民族终于取得了彻底打败外国侵略者的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创造的惊天动地的伟业，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事件。

中华民族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也是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伟大胜利，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发扬了国际主义精神，对日本法西斯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消灭、抗击、牵制了大量日军。这不仅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亚洲大陆的彻底失败作出了伟大贡献，而且也有力地支援了苏联人民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战争，减轻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压力，为早日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整个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牺牲之重、作用之巨，是举世瞩目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增强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为了使广大青少年和后来人更加了解这段历史，编辑出版一套全面反映中华民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浴血奋战、英勇牺牲，为国家、为民族、为世界人民立下不朽功勋的历史的丛书，对增强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的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和自强不息精神，对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对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将大有裨益。

这套丛书不仅以大量篇幅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和所取得的卓越成

就,而且对广大爱国的国民党官兵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中所作出的贡献,也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和论述;不仅直接阐述了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而且对海外华侨、国际爱好和平人士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大力支持与贡献也作了叙述;不仅对社会上层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作了如实阐述,而且还把视线瞄准了广大基层人民;不仅重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而且还对这一时期的社会、学术、思想和文化等也作了介绍,力图使读者能全方位、多视角、多层次地了解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全貌。无疑,这对推动抗日战争史研究,促进学术发展和繁荣是很有作用的。

1992年6月

编 辑 说 明

抗日战争是近代 100 余年来中华民族首次打败外国侵略者的民族解放战争,是反法西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在全国各族人民,包括各民主党派、各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海外侨胞团结奋斗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热情支持下取得的。中国人民在抗日最前线浴血奋战,英勇牺牲,为国家、为民族,也为世界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为了全面反映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之概貌,确立中华民族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促进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学术进步与繁荣,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我们编辑了这套丛书。

这套丛书是一套学术丛书,丛书规模在 50 种左右。选题范围,时间上始于 1931 年“九一八”事变,迄于 1945 年 9 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内容上包括“政治系列”、“经济系列”、“军事系列”、“外交系列”、“人物系列”及“综合系列”等。从 1992 年开始陆续出版,到 1995 年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之际全部出齐。

本丛书的编辑方针是高举爱国主义旗帜,贯彻忠于历史、实事求是的原则,以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为研究对象。既要反映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和贡献,又要反映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相互关系;既要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对抗战取得胜利的卓越贡献,又要反映国民党中央统帅部和广大爱国官兵对抗战的贡献;既要反映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状况,又要充分展示此一时期中国的社会、

学术、思想、文化情况；既要反映当时决策层的情况，又要反映广大基层人民的情况，等等。总之，我们试图全方位、多视角、多层次地来考察抗日战争，将抗日战争的全貌展示在广大读者面前。

本丛书在编纂体例上，既照顾丛书的完整性，又兼顾各专题的相对独立性，尽量做到点面结合。在学术观点上，尽量照顾、尊重各作者个人的观点，不做统一要求，只要论从史出、逻辑严密、自圆其说、利于学术之发展与繁荣、符合本丛书的主旨，我们即予承认。

本丛书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关照。身经抗日烽火的杨得志将军为本丛书作了序，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专家学者等都关心着本丛书的问世，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对本丛书的编辑出版给予了大力的支持。这样，才使本丛书在政治上、学术上更加全面、完善、健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同志，为本丛书的出版付出了十分艰辛的劳动。在此一并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谢意！

《抗日战争史》丛书编委会

1992年6月

前 言

外交与军事是抗日战争前日本对外政策的两翼。研究在战前日本外交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九一八”事变,应把外交和军事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往的研究多是侧重于军事研究,以关东军和日本陆军中央为主要研究对象,并取得了相当的成果。本书则把“九一八”事变期间的中日外交作为研究对象,在主要研究日本外交、特别是日本外务省在此期间的对策和作用的同时,也研究中国南京政府的外交政策。

中外学界把1928年6月日军炸死张作霖作为“九一八”事变的起点,把1933年5月的《塘沽协定》作为“九一八”事变的终点,这已成为一般的通论。现今学界对1928年至1930年的中日外交研究已较为充分,并出版了几种专著。为此,本书拟着重研究和阐述1931年9月至1933年3月日本退出国际联盟期间的日本与中国的外交。

“九一八”事变虽因1933年5月的《塘沽协定》而大体结束,但“满洲国问题”却一直延续到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时期,并成为日本战争外交的一部分。所以,本书还想进一步从日本军事史和外交史的角度,来探讨1933年至1945年8月战争结束时为止的伪满问题。

所谓外交,在狭义上是指通过国家间交涉来处理对外关系,即以外交部门为中心来处理涉外事务;在广义上则是指某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和各种对外交涉等。本书所要探讨的,是广义上的外交,即以外交政策和对外交涉为中心的中日外交史。

关于“九一八”事变的名称问题。日本在事变初期称为“满洲事

变”，在当时，中国则称为“东三省事件”或“奉天事件”，而中国共产党的文献中也曾称作“满洲事变”，后来才改称为“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已经成为历史，它是 60 年前的那个不幸时代的产物。历史在前进，社会在变化，现在的中国和日本都进入了历史发展的新时期，因此，我们能够使用中日双方的历史资料，在中国和日本之间进行有关“九一八”事变及中日外交史研究的学术交流，并对中国和日本的外交加以研究比较，这是从那个不幸时代的历史教训中得到的中日友好的恩赐。中日两国人民今后还将从“九一八”的研究中得到更多的历史教训，并为进一步发展中日友好关系而努力。我研究“九一八”事变期间的中日外交史并出版本书的目的也在于此。如果本书的出版有助于促进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并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交流，则将感到荣幸之至。

“九一八”事变和伪满问题涉及中国和日本的数十万、数百万乃至数千万人。现在的日本孤留儿问题，就是“九一八”事变和那个时代遗留下来的。由于历史资料不够充分等原因，“九一八”事变的研究还会留下许多不明确的地方。特别是日本军部与内阁、外务省的内在关系，以及中国对事变的外交政策等等，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本书的出版并不意味着这一研究的终结，而是新的研究的开端。

本书集中了我在国内和在日本研修期间的研究成果。根据南开大学和日本早稻田大学、爱知大学的学术交流协定，我有幸在上述两所日本的大学研究“九一八”事变这个课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也是中日两国间学术交流的产物。在本书出版之际，我要对早稻田大学和爱知大学表示感谢，同时对恩师吴廷璆教授和对本书写作予以指导、协助的大畑笃四郎教授、江口圭一教授和安井正幸、马场公彦等日本朋友表示诚挚谢意。

本书原用日文撰写,于 1986 年 9 月由日本的东方书店出版。
此次出版,作者对一些章节作了增补和修改,由朱庆余、李树果两位译成中文,在此致谢忱。

俞辛焯

1995 年春

序 论

“九一八”事变期间的中日外交,是由中国南京政府对日本、对国联、对列强的外交与日本对中国、对国联、对列强的外交构成的。序论首先综述日本在事变期间的外交和南京政府的外交政策,然后对中日外交加以简明的比较,以达到进一步深入了解“九一八”事变历史的目的。

“九一八”事变期间的日本外交,和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及尔后的全面侵华战争、日美太平洋战争期间的外交相比较,有其特异性。这种特异性是由于“九一八”事变是以特殊的形态爆发的,而且是在国际联盟已成立这一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

这里所说的特异性,并不是绝对的,只是相对而言的。特异性中包含着普遍性或共同性,日本在“九一八”事变期间外交的特异性,也是日本外交的普遍性或共同性中的特异性,并不是与以往或尔后的外交完全不同的。

近代日本外交的普遍性或共同性是战争外交。战前的日本是军国主义国家,军事和军部在其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各个领域内都占有重要地位。在对外政策方面,军事和军部也占据优先地位,其对内政策也是为军事服务的。这就是所谓军国主义的特征。因而,处理对外问题的外交,在民主国家不过是实施本国外交政策的一种手段,而在军国主义日本却成了推行战争的手段。和民主国家相比较,这是军国主义日本的外交特征,也是近代日本外交的普遍共同性。

战争外交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战前外交、战时外交和战后外交。本书对“九一八”事变期间的日本外交也拟分作三个时期加

以叙述。从时间上划分,将1931年9月18日以前作为事变的战前外交时期;将“九一八”事变至第二年3月成立伪满洲国,作为事变的战时外交时期;将尔后至1933年3月日本退出国联,作为事变的战后外交时期。从军事上来看,事变的战后外交还应包括1933年5月的《塘沽协定》的签订,从外交史的角度来看,还应将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后为促其获得国际承认的外交作为战后外交的一个部分。

事变前的日本外交,是两次战争期间、特别是华盛顿会议之后的外交的继续,其外交任务是首先通过和平手段达到其侵略目的。如果外交手段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则诉诸战争。但是,“九一八”事变是以特异形态爆发的战争,是在关东军掌握挑拨战争的主动权,陆军中央的部分中坚人物的怂恿下,用阴谋手段发动的。这次战争不同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以及太平洋战争,它不是经过阁僚会议、军部首脑会议和御前会议的最后裁决,并动用统帅权而挑起的战争。所以挑起这次战争的决策过程,在日本的对外战争史上也是异乎寻常的。日本外务省没有直接参与这次事变的挑拨行动,也没有进行挑起战争的外交准备。没有外交上的准备便突然地进行战争,这是“九一八”事变的一大特征。

然而,这并不是说日本外务省在事变之前没有起任何作用。事变之前发生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这两个事件是爆发“九一八”事变的间接导火线。在处理这两个事件中,日本外务省采取了积极的外交行动。万宝山事件是日本想在“满蒙”获得土地租借权,进一步扩大殖民权益的事件。把经济外交作为外交观念之一的币原外相,为了获得这种权益曾几次电训一时动摇并想从当地撤出警官的长春、吉林领事,要求他们以强硬的态度作出最后的努力。中村事件是由于日军大尉中村震太郎为了侦察兴安岭的军事地形而进入该地,被当地的中国驻军依法处死而引起的事件。但日本外务省的派出机构对这种特务活动进行强词夺理的争辩,并想利用

这一事件扩大日本在东北的权益。

日本外务省的这种努力,虽说与关东军的最高目的也即通过武力占领“满蒙”不同,但和关东军想要扩大日本在东北的殖民权益是一致的。通过外交交涉而没有完全解决的万宝山事件中的土地租借权问题,由于“九一八”事变而解决了。所以两者试图在“满蒙”扩大日本帝国的所谓“国益”上,有着共同性。以日本外务省为主导的对上述两个事件的处理,虽被日本的社会舆论谴责为“软弱外交”,但日本外务省对上述事件的强词夺理及其对中国方面所采取的外交政策,却造成了日本挑起“九一八”事变的舆论,并为之打下了社会基础。这说明日本外务省和币原外交,在通过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而行使武力问题上虽与关东军有所不同,但双方又有共同点和相近的地方。“九一八”事变初期,日本外务省和币原外交,在对外问题上与关东军和日本陆军中央所采取的行动大体上是一致的。其根本点就在于此。

但是,日本外务省和币原外交没有为事变采取诸如争取列强的谅解、与特定的列强缔结同盟关系,以及在外交上孤立中国等方面的外交措施。这也是事变产生的“满洲国”未能获得国际承认的外交上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日本在事变前的外交,既和事变有密切的关系,但又没有进行直接的开战外交。这正是其外交的一个特征。

那么,事变中的日本外交又当如何呢?

“九一八”事变中的日本外交的特征之一,便是一边进行战争,一边开展积极的外交活动。这在日本外交史上也是罕见的。在以往的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尔后的太平洋战争中,日本外交主要是开战外交或“终战”外交,在战争中的外交活动比较少。而在“九一八”事变中的日本外交,之所以那么积极开展活动,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的中日两国既处于战争状态,又没有完全断交;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当时存在着国际联盟组织以及国联盟约和九国公约。这种

特征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特定的国际关系中产生的。

“九一八”事变中的外交，是以国联（列强）、中国和日本这样的三角关系而展开的。日本对中国、对国联和对欧美列强的外交，虽有直接交涉的一面，但主要是以国联为舞台而展开的。日本为了排除第三国对事变的干涉而主张直接交涉；而中国则想把日本的侵略行径诉诸国联与列强，并想借助国联和列强的力量制裁日本，以期解决事变。因此，以国联和列强为中心，日本和中国便展开了外交上的攻防战。

在这种外交攻防战中，由于日本与中国是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因而从根本上说是针锋相对的。而处于中间或中心地位的国联与列强，则对日本和中国采取了双重的外交政策。

何谓双重的外交政策呢？国联是由世界上大小五十几个国家组成的，但它主要代表欧美列强的利益。因而，与国联的关系可以说主要是和欧美列强的关系。欧美列强和日本都是帝国主义国家，它们具有侵略中国、保护和扩大在中国的殖民权益的共同性，为此而相互同情、合作及支持对方保护既得权益。但日本和列强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为了扩大各自的权益和势力范围，又相互排斥和相互争夺，因此有时会出现反对对方的侵略并加以限制的情况。这种两面关系便是列强与日本之间的双重关系。欧美列强和中国的关系，基本上是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欧美列强对日本侵略中国具有同情与支持的一面，但为了牵制日本对中国的急进性侵略，同时也为了与日本争夺中国，又有利用中国抵抗日本的一面，从而不能不考虑中国的某些反侵略要求。这就是国联或列强的双重外交政策。国联或列强对中日双方的这种双重的外交政策，使日本和中国的侵略与反侵略这一简单的外交关系更加复杂化了；而中国在“九一八”事变中的外交，也是在这种复杂化了的三角和双重的关系中展开的。在考察“九一八”事变期间和尔后的中日外交时，需要首先想到这种基本的外交关系。这也是本书研究“九一八”事变时期中日

外交史的一个核心的框架。

“九一八”事变中的外交特征之一，是在事变初期有过扩大与不扩大的二重外交。这在日本战争史或外交史上也是罕见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罕见的现象呢？20年代，特别是在日本政党内阁时代，日本对中国的外交曾是二重外交。这是在华盛顿体制的牵制下，也是在政党内阁的新的政治体制下发生的。这种二重外交一直延续到事变前的中村事件。如果挑起“九一八”事变的决策，是通过正式的决策过程，那么这种二重外交则将是经过外务省与关东军及陆军中央的调整，成为对事变的统一的外交政策。但是，“九一八”事变没有依循这样的决策过程，所以20年代的乃至针对中村事件的二重外交便延续到“九一八”事变，并成为扩大与不扩大的二重政策。

在这种二重外交中，币原外交坚持了不扩大的方针。这个时期的所谓币原外交，代表了币原外相个人的外交观念或外交原则，同时也代表了这个时期的若槻内阁的对外政策。币原外交也有二重性。对内它主张不扩大，并限制关东军的军事行动；但作为代表日本帝国的外交，它为关东军的阴谋的军事行动又进行了全面地强硬辩解，并为了使这种军事行动得到国际性的保障而作了一贯的努力。以往对币原外交的研究和评价有一种倾向，即侧重于它在事变初期的对内牵制作用，而忽视了它对国联、列强和对中国外交上的作用。为此，本书在承认币原外交对内作用的同时，着重研究它的对外作用，并对“九一八”事变中的币原外交进行全面考察。

在“九一八”事变中，币原外交的主张是与南京政府或张学良进行直接交涉。这种直接交涉的主张与币原外交在事变初期的不扩大方针是相互对应的。币原外交是想利用关东军在事变初期的军事上的“胜利”，通过与南京政府或张学良进行直接交涉，以解决在东北的300多件有关殖民权益的悬案，并收拾“九一八”事变的残局。这里包含着币原外交的外交观念，即通过非军事的力量来维